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二战时砂拉越华人的 民族精神建构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ism of the Chinese in
Sarawak during World War II

阮光安
(WAN Kong Ann)

摘要

二战期间砂拉越也遭到日本的入侵，与星马华人相同，当地华社也因为在此前支援中国抗日而受到日军的报复。三年八个月的日据统治，让当地华人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求存，苦不堪言。这场战争给砂拉越华人最深刻的教训便是：当战火燃起，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都保护不了远在砂拉越的子民，华人必须抛弃固有的移民思想，转而关心和保护脚下这片土地，并愿意与其他族群共同建设这个本应独立自主的国家，才可能避免再次遭受侵略和被掠夺的灾难。这种思维的转变让当地华人萌生了自强自救的民族意识，背负着的民族苦难激发了重塑民族精神的迫切需求。

关键词：日据时期、砂拉越华人、抗日筹赈、南侨机工、本土民族精神

Abstract

Sarawak was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Like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Sarawak Chinese community was also retaliated by the Japanese army for supporting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or the Chinese in Sarawak during WWII, the most profound lesson is: when the war breaks out, neither the UK nor China can protect them, they must abandon the inherent immigrant thinking and turn to protect this land by themselves, so they are willing to work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to build their own country. This change of thinking gave the local Chinese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help, and the national suffering they were carrying inspired the urgent need to reshape the spirit of nationalism.

Keywords: Japanese occupation, Sarawak Chinese, Anti-Japanese relief fundraising, Nanqiao mechanic, local nationalism

一、前言

上个世纪中后期，和平似乎离开东南亚远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冲击——致使东南亚社会突逢巨变。一方面是日本取代了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等殖民地宗主国，在东南亚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新秩序之内，另一方面却也激起了东南亚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为战后反殖反帝的独立运动奠定基础。（梁英明、梁志明等2005：394）

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就大肆向东南亚进攻。位处岛屿东南亚中心地带的婆罗洲不乏其战略作用，日军肯定不会视而不见。（陈鸿瑜2012：246）1941年12月16日清晨，数量约一万人的日本军队登陆砂拉越中部美里（Miri）丹绒洛邦（Tanjung Lobang）的布莱顿沙滩（Brighton Beach），砂拉越被侵略的梦魇由此开始。美里与石油王国汶莱毗邻，这一带海域是婆罗洲北部航线船只必经之路，也出产品质极佳的天然气与石油，（芭芭拉、伦纳德2010：305）日军在此地登陆，明显有其战争资源的战略策划。此处海域水文多变，因此在沙滩高处建有一座灯塔，守护往来船只。日军一登陆，就攻上灯塔，杀了灯塔的看守员。（杨曜远2018）之后便迅

速深入砂拉越腹地，开始在砂拉越的军事侵略行动。

12月24日，正值圣诞节前夕的平安夜，人们还沉浸在拉者王朝百年纪念和佳节庆典的欢愉中，砂拉越首府古晋便已沦陷。在接下来的短短两个月内，日军就攻克婆罗洲防线，占领了砂拉越、汶莱和北婆罗洲（沙巴）英属婆罗洲三邦。（Bob Reece 1998）

日军的入侵对砂拉越人民——尤其是当地华侨来说确实是有史以来最可怖的灾难，因为所有人都明白，日军攻打东南亚的主要目的除了是大肆占领，还有便是要对华侨进行报复与控制。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远在南洋的华侨同仇敌忾，陆续组织群众支援祖国军民进行斗争。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的资助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军事抵抗力，令日本侵略军的侵占计划备受阻碍，日本军方因此十分痛恨各地华侨，侵略所到之处，当地华社首当其冲。此外，由于东南亚许多地区的华社都有着关键的经济影响力，控制了华社就等于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命脉，因此直接对华社下手便成了日军占领计划中的主要行动之一。由于各种主观条件的限制和客观情势的发展，中国国内的人民和海外各地的华侨虽然团结合作对付日寇，但是日军不仅没有被击退，反而神速南下，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导致当地华社也遭受到残暴的报复与伤害。

二、砂拉越华社与中国在抗日上的情感连结

（一）砂拉越华社的抗日背景

东南亚华侨的反日意识可以追溯到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当中国各大城市抵制日货运动的消息传到星洲、马来亚一带，很快就激起华社的同情与共鸣。不过明显地由于缺乏组织和当地私会党的借题发挥，新文化运动在星马却变质成“反文明运动”，许多华侨由于情绪失控而任意破坏甚至伤人性命，变成了暴乱的帮凶。新加坡就发生了华人商店售卖的日货被捣毁、日商肥皂厂被洗劫的骚乱；檳城则发生毁店焚车、抢粮袭警的流血事

件；吉隆坡华人聚居的茨厂街也发生小规模示威和暴乱。（李恩涵2015）虽然在砂拉越没有发生类似乱象，不过当地华社平日关注时事的谈资已离不开远方大陆的运动和星马华社的局势，平静的生活因而有了异常的波动，这对砂拉越华社来说恰似山雨欲来的潜在忧虑。

中国大陆时局的不断恶化持续影响着东南亚华人的生活。1925年5月的顾正红被杀事件、1928年5月的济南惨案、1931年7月的万宝山事件等，日本帝国主义每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惨案，都会引起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马来亚——华侨迅速而剧烈的反应，仅一海之隔的砂拉越华社商界和政界向来与新加坡联系密切，自然也是积极响应星马华社的呼吁，加入抗日的行列。

战争时期，南洋众多华侨的民族情绪激昂，加上长年以来的生活负担，以及面对殖民政府的限制与压力，因此通过教育与宣传抗战意识和爱国情操在华侨社群中建构出来的“国仇家恨”很容易就获得共鸣与认同。在当时那种抗敌与爱国热情与激动强烈交织的大环境里，华侨的各种抗日行动虽然有理有据，不过却难免有悖于当地的民情与法规，造成华侨与当地政府及土著社群一定程度的撕裂。以抵制日货运动为例，华侨组织各种“便衣队”“铁血团”来惩处售卖日货的华商，除了警告罚款便是致伤致死的人身攻击，这在当地政府眼里自然是和私会党无异的激进犯法行为，执法单位如不加以制止便是失责于维护社会治安，因此有关当局才会对华侨的抗日活动严加管制。

从当时的国际关系状态来看，统治着东南亚多个地区的英、法、荷、美等殖民政府，战争初期为了不与日本正面冲突，对中日战争是坚持严格的中立态度，极力戒备国民党或共产党在东南亚的任何抗日活动。殖民政府对当地华侨社团，尤其像是中华总商会这类凝聚力较大的团体，表面上虽然宽容，实际上只要是涉及政治事项，执法者常常变得十分严厉苛刻。当地华侨必须压制熊熊燃烧的热血，以更机智和弹性的方式来进行筹款抗日活动。虽然到了后来局势出现大转折，殖民政府的态度与政策有了明显的转变和放宽，但那已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开始践踏到南洋来的危急时刻了。

（二）砂拉越华社的抗日筹赈运动

在中国抗战期间，英属婆罗洲三邦华侨也热烈进行筹赈。当时这些地区人口分散、交通不便，英国政府也不允许公开抗战筹赈活动，不过许多华侨聚居的城镇和小村都依旧成立筹赈组织，砂拉越各省、县、埠的华侨筹赈会与分会有记录的至少有三十三个。（房汉佳、林韶华2013）¹ 由于各埠地小人少，一举一动都极容易为当地政府知悉，因此对外多是以俱乐部名义进行筹募。这些抗日救国团体，在北婆罗洲东海岸、汶莱和砂拉越多以“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为名；西海岸则多称“华侨救灾会”。各个城镇救亡团体多是由当地重要侨商领导策划，事务方面则多由各地侨校校长和教员兼办。

1939年二战欧洲战场烽烟四起，作为与宗主国英国紧密联系的砂拉越自然也受到影响。当地华侨社会也积极投入各种援助英国军费的活动，以第三省为例，诗巫华侨筹赈会的许多重要成员立即组织“马来亚援英义捐会沙罗越第三省分会”（Malaya Patriotic Fund, Sarawak Branch）及“沙罗越第三省援英战费筹备会”（Sarawak War Effort Fund, Third Division），侨领张宗罗身兼二职，同时担任华侨筹赈会和援英会主席。尽管负担极重，对于战前身份处境较特殊的华人群体，这种积极主动援助英国的态度，得到了当时布洛克政府及当地土著社会的认同与支持，援英会成立后，华侨筹赈会的工作明显更加便利。（蔡增聪2007：5）

砂拉越的华侨也积极响应对岸新马华社的筹赈活动，“砂劳越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于1937年初，办事处就设在当时古晋海唇街1号2楼电话174号潮州公会会所。（丘立基2003：182）根据下列表格中两届“总会”的领导层身份来看，明显是团结了整个古晋华侨社会各个籍贯的力量，显示了当时大家不分畛域合力护国的珍贵精神：

表一：“砂劳越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领导名单

	理事职责	姓名	侨团身份
第一届	主席	黄庆昌	华商商会主席、福建公会主席
	第一副主席	陈木林	潮州公会理事
	第二副主席	陈三元	福建公会理事
	第三副主席	李永桐	广惠肇公会主席
第二届	主席	简长伯	广惠肇公会主席
	第一副主席	杨捧章	客属公会创会会长
	第二副主席	张运琚	琼州（海南）公会主席

资料来源：房汉佳、林韶华2013：286-287。

可惜的是，有关这一团体的所有资料，都在日据浩劫中全被销毁，目前仅存少许口述与传说，进一步详情已难以考究。不过可以确认的是，砂拉越筹赈组织的结构和制度相当健全，行政与管理都颇具效率，基本上就是参照了星洲和马来亚筹赈会的工作模式，领导层在处理业务之际也展现了他们负责严谨的态度，更为难得的是各属侨领都可以合作无间，处处按章行事、事事力求完善，尽量避免疏失，只为不贻误筹赈大业。（蔡增聪2007：3）

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的南侨总会²代表大会，砂拉越华社便派出七名代表——古晋黄庆昌、黄友谦、涂耐冰；美里庄有成、杨毅英；诗巫刘家洙、陈仲簏——出席并配合陈嘉庚带领的筹赈运动。（杨建成1983）相对于其他如马来亚、菲律宾、荷属印尼各地的华侨，砂拉越华侨的人数和经济实力自然无法比拟，不过是尽力响应南侨总会的呼吁和支持相关筹赈活动，以表些许诚意与责任。对于砂拉越华社的有限能力，陈嘉庚先生也是看在眼里，他知道当时的英属婆罗洲“远逊荷属婆罗洲，其较繁盛商埠，只有古晋，其次诗巫（巫）……俱非大出入至商埠。华侨虽有八余万人，劳动界居大部分。抗战后诸埠亦多成立筹赈会。新加坡召集南侨代表大会，亦派有代表参加，至人常月捐仅古晋，诗巫（巫）认国币数万元，颇能逐月照数汇交。其他所捐无多，且亦不能逐月继续不断”，

（陈嘉庚1979：398-399）战局吃紧，急需大额赈款，不过陈嘉庚先生还是会依据各地华侨社会的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判断和要求。

砂拉越首府古晋的筹赈总会主席为闽商黄庆昌，黄氏财力雄厚而且人脉极广，无奈受到各种客观限制，筹赈成效并不尽理想。在砂拉越表现较为突出的，是诗巫区的华侨团体。诗巫是砂拉越重要商埠，兼为省会，华侨约两万一千三百余人，大部均闽人。当地救国运动领导机关原有二：一为1937年9月成立的“诗巫华侨筹赈祖国难民第一届委员会”（简称“诗华筹赈会”），另一为1939年1月成立的“诗巫美以美会筹赈中国难民委员会”（The Sibü Methodist Mission China Relief Fund Committee）。1939年6月，两会合并成“诗巫华侨筹赈祖国难民第二届委员会”，以扩大组织、统一行动。这个委员会一直延续到第三届，两届主席皆由诗巫总侨长及中华商会会长张宗罗担任。由于张氏主持得人，手下人才济济，筹赈工作效绩极佳，从1939年7月至1940年9月，诗华（第二届）筹赈会共筹得叻币152194元。（何凤娇1999）



图一：“诗巫华侨筹赈祖国难民第三届委员会”（1940）合影

资料来源：蔡增聪编2007：16。

说明：前排黑衣者为委员会主席张宗罗。

直至1940年12月，北婆罗洲华侨团体筹得叻币429700余元、汶莱筹得叻币24908余元、砂拉越筹得叻币459886余元，各埠华侨赈款总计叻币914495余元，折国币417000余元。由于当地政府施行外汇统制，所有义款都先交到新加坡彙汇，（何凤娇1999：130）其中有一部分捐款是汇寄给行政院转入“战时儿童保育会”，帮助在战乱中的失孤，还有一部分是转给“全国慰劳总会”，余者则全数汇寄给南侨总会。（李盈慧1999：64）此外，当地教育界人士也发起募集寒衣代金运动，仅三个月就超额完成一万套寒衣的目标，后来又响应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发起的筹集五十万件寒衣分赐前线将士活动，诗巫指配到五千件的要求，诗华筹赈会举行各种筹募活动，也极早就达标。之后南侨总会也来函请求分摊寒衣代金义款，诗华筹赈会也配合积极推动，如愿募足。（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3）

筹赈运动是砂拉越华人社会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总动员，显示了这个族群在看到远方祖国面临存亡之际，上至殷商富贾下到贩夫走卒，大家难得地展现了一致抗敌的集体意识及救国救亡的强大决心。在砂拉越的筹赈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筹赈会充分整合了商团、会馆、教会和学校等单位原有的联系网络，使各种通讯与宣传工作得以有效率地上传下达。像是砂拉越中区的传统商业网络，在筹赈运动期间就及时提供了诗巫筹赈会和其他市镇与村落的联系便利，而美以美筹赈会在诗巫乡区的广泛影响也是源于教会长期在乡区设堂办校所建立起来的人事网络。第二，各个筹赈会的领导人不仅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者甚具名望的商贾，整个领导层也兼容了华社不同群体及阶层的精英，战前普遍可见的方言帮派、业缘阶层、区域藩篱，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华社的空前大团结”——不同籍贯、社群、阶层、区域的华人都团结在共同的理想及目标下，同心协力展开筹赈工作。当然期间也有不少人事纠葛、观念歧异和失信质疑，不过最后大多都有领导层透过社会制裁、人情开导和民族意识感召，来尽力解决问题。（蔡增聪2007）第三，基督教会虽是以传教为重任，不过在动荡时期，砂拉越的华人牧师、传道、教友并没有躲进教堂，而是一手握圣圣经、一手举着宣传单积极参与筹赈运动，“信教不忘救国”成为大家的信念。第四，一直被社会忽视

的妇女和儿童也在筹赈运动中发挥不小的作用，他们主动投入合唱团、售旗卖花、筹办义卖会、下乡巡回游艺会等活动，当时城镇的大街小巷和乡间的泥路草场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积极走动的身影。作为一个民间自发性组织，华侨筹赈会所展现的积极程度和团结精神都令人动容。

（三）砂拉越的南侨机工

砂拉越华社除了在当地积极筹赈，不少有志青年也响应南侨总会号召的《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第六号通告，也就是抗日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南侨机工”队伍。1939年间，砂拉越至少有八十名华侨青年分三批从古晋出发，加入九批总数超过三千两百名的机工大队。他们途经新加坡、西贡、仰光，最后抵达昆明，到当时人们称为“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大动脉”“中国抗战的输血管”（秦钦峙、汤家麟1989：82）的滇缅公路充当运输司机和汽车修理工。

表二：砂拉越南侨机工批次

批次 (总批次)	人数 (总数)	主要人名	出发日期
第一批 (第六批)	3 (124)	叶子英（第六批总领队） 李亚留 陈亚历（陈志生）	1939年5月23日
第二批 (第七批)	20 (117)	廖平（萍）（队长） 李茂书 方亚力	1939年7月24日
第三批 (第九批)	57 (507)	蔡三如（队长） 许海星（副队长） 蔡典欣（中文书） 许思强（英文书）	1939年7月31日

资料来源：房汉佳、林韶华2013：43；丘立基2003：186-187。

服务于滇缅公路运输线上，虽然不像前线般枪林弹雨，不过滇缅公路

的危险情况不遑多让。地面要应付颠簸曲折、悬崖峭壁的路况，随时可能车翻人亡；上空要防御日军飞机的轰炸，尽力避免物资和人命损失。而且所有运输工作都是十万火急和刻不容缓的。他们从缅甸运来轻重机枪、各种型号火炮、弹药等军火，还有汽油、轮胎等工业用品，必要时还要载送军队。滇缅公路从1939年开通到1942年被日军切断，短短三年间，这群机工日夜奋战，确保道路的畅通和物资的运送，以保证达到平均每日三百吨左右的运输量，其中军火就抢运了超过四十五万吨。如果没有滇缅公路上这群“神行太保”的救急运输，我们无法想象抗日战争如何坚持到最后胜利。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一千零二十八名华侨机工的直接牺牲以及一千八百名机工的受伤、车祸、疾病、失踪等间接死伤惨况，平均每天有七至八人因公殉职，几乎是每一公里滇缅公路都埋葬着一名南侨机工。

每一个华侨机工可说是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身赴前线，他们所肩负的责任和所作出的贡献，不亚于在前线杀敌的士兵。这些无军阶军衔的华侨运输兵，人们称他们是“滇缅路上不穿军装的军人”。（钟业昌，吴清雄2010：35）极为遗憾的是，滇缅公路被切断不久，留在国内的机工就面临被“裁撤”的厄运，当时的“中缅运输总局”以“奉交通部指令”为由，说是“人浮于事”，对南侨机工所有车队员工均作“遣散处理”，要他们“自谋出路”。（秦钦峙、汤家麟1989：126）这群当年抱着爱国救国情怀的海外赤子，在滇缅公路上为国舍命奔波，最后却被逼入绝境。此外，当年华侨救国不分国共，战时这群机工出生入死以技术抗敌，战后却因为当时许多人是被编入国民政府队伍，导致无法获得应得的待遇。由于政策的失误和对华侨历史的缺失，许多机工在文革时期被迫害、退休生活没补贴没援助、生病治疗不能报销费用，有者甚至露宿街头，被迫行乞，甚至株连后代因“政审不合格”无法升学、就业、参军、提干等，他们的困境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得到改善。（陈毅明、汤璐聪2005）对于许多生前不得善待、死后不得善终的南侨机工，历史还欠他们一个交待。

战争结束，幸存的砂拉越机工也四处流散，有者留在当地，有者漂泊他方，有者较幸运得以辗转回到砂拉越，重新开始另一阶段的生活。随着时光的逝去，在世的南侨机工相继老去离世，不断向前的社会也逐渐淡忘

他们。砂拉越最后一名——也是马来西亚最后一名——南侨机工李亚留已在2018年5月3日与世长辞，享年一百岁。他们完成了历史和民族赋予他们的使命和任务，他们定格在历史洪流中的铮铮风骨，依旧在感召着后人为国家兴亡肩负责任。



图二：南侨机工李亚留1939年入伍照（左）与去世前（2017年10月）近照（右）

资料来源：佚名2018：11。

虽说在战火燃烧到砂拉越前的华侨社会是团结一致积极救国，不过在运动过程中依然可以听到许多不合时宜的声音，似乎在刻意挑剔华侨对祖国的情感。像是“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侨何者更爱祖国”的争辩，就算是放在今天的情境，都会令人感到可笑和无奈，因为是以何种身份和心志来抵御恶势力，显然并不重要，为国家和人道而战才是关键。何况两者的爱国精神也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得到印证：无论是出生成长在侨居地的土生华人，还是生长于中国的新客华侨，在支援中国抗战和抵抗日本侵略方面的力度和气量上是不分轩轻的。

确实，在中日战争时期，东南亚的“民族救亡”和“援助中国”运动主要是新客华侨在领导，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是在大陆某个特定的乡、县或省，也就是所谓的“侨乡”。这种感情和意识对土生华人来说是

不存在或者不一样的，他们当然也十分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战事，但是与之并驾齐驱的还有所在国的现况与前景。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客华侨对祖国的沦陷，和土生华人对居住地的受侵犯，两种感受和命运才交织在一起，成为共同反日的团结性和向心力。孔飞力（2016）在分析林文庆、黄乃裳、曾少卿、陈嘉庚等不同背景的华侨华人个案中也得到相似的结论，从而提出“华人民族主义的马赛克结构”论点。

三、日据时期的砂拉越华社状况

（一）日军到来前的混乱

日军占领砂拉越，自然是帝国主义泯灭天理的丑陋罪行，不过，真正令砂拉越的惨况火上添油的，却是砂拉越的“内部自我崩坏”。拉者政府的仓惶撤退和土著暴民的乘火打劫，加剧了砂拉越各地城镇的混乱和动荡，作为维持经济商贸体系的华人群体，自然首当其冲，成为被掠夺抢劫的主要目标。所以，日军还未真正到来，华社已经“预先”受到伤害了。

由于欧洲战场告急，作为砂拉越保护国的英国已无暇顾及这远方的小领地。对自身实力的高估和对日军战斗力的轻视，令拉者政府对这场侵略毫无防备，几乎可以用“惊慌失措”来形容他们的狼狈应对。（丘立基 2003：174）英国军队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仓促撤退，也直接导致婆罗洲的失守。在这种危急时刻，地方官员竟然没有得到任何防备或抵抗的指示，因为第三代拉者维那·布洛克（Rajah Charles Vyner Brooke）此时正在澳大利亚“度假”，他原先本打算从荷属婆罗洲进入砂拉越，但是当拉者到了万隆时被告知日军已捷足先登，拉者便改变计划，从万隆返回墨尔本，再准备回伦敦。而在此之前，拉者家族也都乘早逃离砂拉越，其他一些一早得到消息的高级欧籍官员及家属也都无声无息逃离，只留下辅政司和少数官员及一小队旁遮普军队，驻守偌大的砂拉越。为避免被日军获得更多信息，政府的档案、财政账目及相关文件都在官员撤走前尽数焚毁，来不及开走的飞机和船只也尽数被毁坏。

待到日军逮捕了辅政司等人，古晋剩下的政府官员和印裔守军才匆忙向新尧湾和石隆门方向逃亡，希望可以南下逃向荷属印尼加里曼丹。无奈事与愿违，除了逃亡路上因不堪跋涉而亡的少数人员，生者都在半途被日军拦截，大部分官员、家属及守军都被扣押至古晋峇都林当（Batu Lintang）囚营。砂拉越中区（诗巫、成邦江一带）有少部分官员成功取道拉让江上游，狼狈越过卡布阿斯谷地（Kapuas Valley）逃到印尼坤甸（Pontianak），之后再逃往澳大利亚或英国。

总之，对于日军的侵略，砂拉越政府的懦弱无能和不战而败都看在人民眼里。砂拉越可以说是被“遗弃”的，官员撤离前对机场、码头、工厂等地的破坏虽然说的不让日军“捡到便宜”，不过也直接瘫痪了各地的经济生产及基础设施，导致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屈服于日本导致英国的声望在砂拉越人民心中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尤其在备受折磨的华人更是对拉者政府的不负责任感到深沉的失望，随之而来的便是强烈的愤怒。新加坡、马来亚和砂拉越的华人都感觉自己“被英国人出卖”了。（芭芭拉、伦纳德2010：305）

（二）无政府状态的暴乱

官员和守军都逃走和被捕，砂拉越各个城镇顿呈无政府状态。没了警察和军队的守护，当地达雅人被拉者政府压抑了整百年的野性得到了重新释放的机会。许多土著暴民乘着混乱，大肆抢劫华人商铺，尤其是在日军轰炸机空袭后的一段真空期，许多暴民都冲到街头，目无王法地狂抢城镇商店的钱财和商品，上前阻止的店家或工人难免遭到群殴甚至杀害，因此大多华人商号店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辛苦经营的货物及钱财被洗劫一空。

除了商店的财物和货品，公家仓库所囤积的大量米粮及日用品也成了暴民的目标。这些粮食和用品本是为了应对紧急时期才能动用的，无奈政府官员撤走时既没办法运走，也不可能加以销毁，于是暴民便以大木柱撞开仓库铁门，将仓库内的白米、面粉、布匹等日用品全数劫走。在抢劫的过程中，也出现弱肉强食的乱象：个子较瘦弱的人拼搏抢出东西，马上

就有高大强壮的人一拥而上把瘦子拼命抢来的东西轻松夺去，瘦子自知不敌，只好再去抢比自己弱小的人。残暴的日军还未到来，许多城镇就已经被暴民破坏得一塌糊涂。

此外，就连一般的华人住家也受到土著暴民的侵扰。大部分经商打工的华人聚居在城镇，另外还有不少华人散居在附近郊区的橡胶园或丛林里（当地俗称“山芭”）。根据一些老人家的回忆，当时他们居住的茅屋就曾经被一群土人包围，打算抢劫杀人，所幸家里有三把猎枪，火拼之下得以保全。在那一个多月的无政府时期，许多华人家里都会准备着砖块、玻璃瓶、木棒等物，作为土人来袭的防御之用。（刘子政1996a）此间也有一些华人因外出遭到伏击不幸被杀害，惨遭猎头。

政府不复存在、土人聚众滋扰，华人就只能设法自保。稍有财力的商贾或许还可以忍痛花重金雇人看守资产，一般民众则只能抱团取暖了。以砂拉越中部市镇泗里街（Sarikei）为例，12月27日全部英籍官员都逃离泗里街，内陆的达雅人聚众两百余人，从上游乘船而来，准备进击市区进行抢劫。所幸此时市区的华人和马来人已集合市区和山芭的居民共千余人，他们组织了自卫团，维持市区治安的同时自行防备，那群达雅暴民见到市区人多势众，双方实力悬殊，才不敢蠢动来市区抢劫，而是派代表前来与华人自卫团领袖谈判。华人见他们缺钱少粮，便从自身储备的仓库中取出米粮和钱财，分于众达雅人每人米数斤、钱五元，达雅暴民也投桃报李，当场杀猪起誓不再来市区滋扰。（刘子政1996b）

（三）弄巧反拙引狼人室

团结自保虽然可以解除一时的忧患，不过毕竟不是长远之计。此时全天下都弥漫着战火硝烟，和平时期的文明管制不复存在。经过三代拉者政府对华人的分散管理和严加管控，砂拉越各地的华人社群已不再像一百年前的华人公司那般，有组织武装和抵御外敌的条件。在这非常时期，华人群体自身的储备有限，一度依赖的拉者政府又已逃之夭夭，土著暴民的威胁尚未解除，外患（日军占领）未至，内忧（土人作乱）已生，华社领袖

最终不得已，只能对现况妥协。像是在诗巫，经过一个月的混乱，诗巫华社商团经过商议，决定派王水德、杜瑞珠、黄鼎州三人为代表，联同两名马来海关人员，前往古晋“邀请”日军来掌管诗巫。1942年1月29日，日军派遣十多名“浅尾队”士兵来到诗巫，当地华社便在漳泉别墅设宴款待他们以表欢迎，经过数天查实情况，这批日军便回古晋去了，直到6月23日才派“省长”千田侃次郎率队六十余人来接收诗巫。（刘子政1996c）日军将诗巫市改名为“志布”，表示皇军的“伟大志向已得到广布”，并在9月下旬组织了傀儡机构“志布州同调会”，由闽籍侨领张宗罗任会长，兴化侨领林开臻任理事长，前筹赈会会员均被选任各部职员。（黄孟礼2007）而“久镇（古晋）同调会”会长则由王长水担任，李永桐为秘书。“同调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代日军收取国防金、人头税以及发布日军下达的命令与条规。这个由当地华族名流组成的民团组织美其名为“以华制华”，实则是借此管道控制华侨，进一步分裂华社。侨领们虽然心里明白这是一份里外不是人的“苦差”，但是相关委任皆是日军单方面的指示，诸位华人领袖迫于局势也无从推诿。

战争过后，大众痛定思痛，反省和思索战时的社会现象和个人作为，此刻出现各种有关“亲日”“汉奸”“卖国”一类的争论，其中一个自然便是诗巫华侨派代表去古晋请日军来掌管诗巫这件事。有人批判这便是“现代版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振源、家昌等1995）是典型的媚日行为；有人则认为是华社审时度势后的无奈之举。根据当时的局势看来，当国家无政府，暴民正作乱，一群无所依靠的华人如果不尽早找到可以控制局面的势力来镇压混乱，很可能就会面临灭族之虞。当时除了占领古晋的日本侵略军，再无其他足以管控土著暴民的力量。因此当地华社主动要求日军前来诗巫，原意是希冀自保不受侵犯和力求社会稳定的决定，只是没想到弄巧反拙，致使引狼入室。当年诗巫侨领的做法是功是过，也只能留待后人评说。

（四）日据时期砂拉越华人受到的迫害

由于中日战争期间东南亚华侨对中国的各种支援壮大了中国的抵抗力量，令日本的侵略计划备受阻碍，日军因此对东南亚的众多华侨也恨之入骨。九一八事变后，华侨在南洋大力抵制日货，令日本在南洋经营多年的经济系统受到破坏。欧战爆发后，南洋华侨又积极支持盟国对抗轴心国，这些作为都致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南洋华侨产生极大的仇视和防范。加上各地华侨庞大的社会影响与经济力量，令日军特别畏惧，将之视为“南进”扩张的重大障碍。早在日军占领南洋之前许多年中，日本军方、外交部和私人谍报人员，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南洋华侨的情报，准备在“南进”时对付华侨。（吴凤斌1993：730）因此，当侵略军逐一攻占东南亚各地，当地华侨自然首当其冲成了日军首先对付的群体。

敌人已经来到面前，大难临头的不仅是他们的“新仇”，还有之前的“旧恨”。一切筹赈活动自然是被迫中辍，更可怕的是筹赈活动的领头人和积极参与者，理所当然成为日军首先对付的目标。于是，这之前用来进行宣传 and 呼吁的名单，成了许多华侨的“催命符”。日军很容易就获得之前活跃于筹赈救亡运动的华人领袖和积极人士的名单，大逮捕行动由此展开。

逮捕行动先是在古晋开始，筹赈会委员、中华总商会执委、各个同乡会理事，都成为日军逮捕的目标。在古晋被捕的众多华人领袖中，时任“砂劳越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主席简长伯名列“榜首”。简氏一被捕就在狱中受到各种严刑折磨，日军占领砂拉越三年八个月，他就被监禁了三年八个月，但始终不屈服，后来虽然保住性命，挨到日军投降，不过却在获释前在狱中中风瘫痪，砂拉越光复不久即撒手尘寰。

在诗巫的情形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诗巫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主席刘家洙、张宗罗、周玉麟、黄景和等廿七位筹赈会委员都被捕，在狱中备受羞辱性的殴打恐吓，这对于身份地位甚高的华侨领袖来说，无异于尊严荡然无存。1944年日本特务宪兵在诗巫和民那丹一带大肆追杀“华侨抗日会”成员，三十余人被捕，也有人在逃跑过程中被枪杀。（丘立基

2003)被捕者除了被酷刑逼供致死数人,“抗日会”会长刘忠宏和秘书张杰儒被枪决后斩首,余者都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发配加帛监狱。翌年联军战机攻打加帛,其中两人中弹身亡,剩下的数人则有幸得以坚持到光复获释。(黄建淳1999)这群有为青年经过此番劫难,命运也从此改写。

占领了城镇、捕杀了义士,日军便对束手就擒的当地华社实施各种“抽筋剥骨”的条例。首先就是榨取华社动辄数以百万元计的“国防金”, (杨曜远2018)³ 还有蓄意侮辱华人的“人头税”“赎金”“税契”“完粮”“牌照税”等苛捐杂税来剥削华侨。日军也利用当地土著的单纯心性,训练当地马来警察使用各种酷刑来虐待华侨,像是当时诗巫警察署就成了令华侨不寒而栗的“黑暗地狱”。日军利用马来警察欺压华人,这间接导致当地华人普遍认为这些马来人也和汉奸一样为虎作伥,日久形成一种种族偏见,成为后来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心结之一,这种情形在马来亚尤其严重。日军宪兵队(Kempeitai)拷问嫌疑分子和处决反日分子的刑罚更是令人闻风丧胆:打耳光、罚站、辱骂、乾坤转等已是轻微,鞭打、灌水、熨灼、火烧、钓鼻、拔指甲、倒悬曝日、棍压、跪木等致残致死的种种酷刑令许多无辜良民惨遭虐待。(刘咏芝1984)对于被逮捕又不愿投降的华人,行刑人下手更是倍加残忍,不少人往往就在受刑时死去,也有人不堪受苦,或泄露实情,或谎报假事,或诬赖他人,结果导致更多无辜者受到牵连,一时华人社会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此外,日军占领砂拉越期间,他们的“裸体文化”和设立“慰安所”(杨曜远2018)⁴ 的败坏道德风俗行为,也对当地历来淳朴的民风负面影响极深。砂拉越本是宗教自由和民俗质朴的单纯社会,日军带来的特立独行的日本极端文化极大程度上“污染”了砂拉越民间的思想价值。被占领的侮辱,加上各种诬陷冤狱、汉奸作恶、强征服役、奴化教育、物资短缺,致使砂拉越一片哀鸿遍野、民不聊生。(Bob Reece 1998)

四、日军投降后砂拉越华人的处境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竭尽所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夺

去超过十万人性命的原子弹。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前所未有地发表了《终战诏书》，“用一系列奇怪晦涩却从未提及投降的词汇号召他们（他的士兵、海员和人民）接受和平的到来”。（约翰·基根2015）9月2日，英国、苏联、中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各国代表来到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Missouri）甲板上，一同见证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上将和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及海军代表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正式落下帷幕。

日军败退，和平并没有即刻降临。联军以歼灭敌人作为理由，大举轰炸古晋、诗巫城区，意图“清洗余孽”。许多不谙军情的百姓来不及躲避，也受到池鱼之殃，死伤惨重。单是诗巫城区，在联军十二架战机七十枚炸弹的轰炸下，据说就超过百人横死街头，（刘子政1996）其中多数皆是城区里的华人居民。

延烧多年的战火也不是在一天内就熄灭。日本天皇的投降令从东京传到砂拉越，已是九天之后的事情了。这段期间，在砂拉越的日军犹在做着困兽之斗，不过无论是日军还是联军，大家都已经知道“大势已去”，双方的士气和军心自是成反比。9月11日，澳大利亚第九师司令依思迪克准将（Brigadier Thomas Charles Eastick）代表联军，在青山河口停泊的卡本达号战舰（HMAS Kapunda）上，接受日本在砂军区司令山村少将（Hiryoe Yamamura）签署投降书。（Gabriel Tan 2009）⁵ 仪式过后，澳大利亚军队奉命收复砂拉越全境，正式结束日军在砂拉越的占领。（丘立基2003：180）



图三：日军司令山村少将呈递佩剑于澳军依思迪克准将以表投降

资料来源：Collection Database of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1945.

当老百姓得知日军已正式投降，除了为虎作伥的汉奸和发国难财的黑商之外，无人不感到雀跃欢腾。集中营里的战俘和平民获释，死里逃生后只觉恍如隔世。市民回到市区，虽然住处面目全非却也算是失而复得。一度萧条死寂的街区又慢慢重现人潮和物流。大家都积极面对战后的物资短缺和交通不便等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比和平日子的到来更重要的了。

许多学生烧掉日本学校的课本和校服，大人也焚去家里的日本国旗，企盼将日据时受到的苦难和霉运都随烟送走。多间华文学校重新开课，课堂里却坐着年龄大小不一的学生，那些被耽误了学业的大龄孩子只能以超龄生的身份继续低年级的学习，这种情形成为后来左翼运动中学学潮的一个关键因素。

据说，在古晋和诗巫等待引渡的日军因为担心华人与土著报复血仇，有人以厦门话或台语表明身份，称是来自台湾，压迫华人只是奉命行事，

乞求华人勿报复相残。就算实际情况果真如此，但是当地华人这几年所累积的国仇家恨，实难以三言两语一笔勾销，尤其是年轻华人莫不摩拳擦掌。稍后接管的联军，据悉为了平息民怨，甚至规定缴费一元，即可施以老拳若干来抵消大众怒气。本以为战争刚结束民众应无足够经济能力，怎知竟有不少人排队缴费请准打人。（黄建淳1999：582）

劫后重生之际痛定思痛，大家对战乱与和平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在一场战争中，除了双方（或多方）对抗的士兵必有伤亡之外，身处战区的老百姓都会成为陪葬品。日据时期的砂拉越，究竟有多少华人惨遭杀害，准确数据已无可考。这场侵略战争从此改变了砂拉越华人的命运，在华人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叙述中铭刻下鲜血淋漓的一章。

五、结语

二战期间，虽然日本在砂拉越只是三年零八个月的占领，占领期间也只是禁止了民间——尤其是华人——的一切文化活动，没来得及全面开展日式教育和思想洗脑，但是砂拉越华人在惊怵于日军残暴手段之余，也不免震慑于这个来自东洋军人统治那风驰电掣式的单车行军和钢铁般的纪律管理。对当地华社来说，日据时期的军事侵略是残暴且血腥的可怕灾难，日军的黑暗统治致使整个社会陷入难以言喻的困苦境地。这场灾难激起砂拉越人民的抗拒：有消极的不合作，也有主动的大小冲突。在砂拉越各个城市与乡下，华人与日军及汉奸分子的冲突事件时有所闻。而砂拉越内陆的达雅人和加央人也对冒然前来侵犯的日军进行游击式反抗，据说不少日军将领和士兵的头颅都在深林行军时被他们猎去。

日军在谋划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对南洋华侨制定了“诱使合作”和“展示威力”两大策略来对付华侨。这表明，日本政府和军方在占领初期对华侨政策的出发点是：首先用高压手段强迫华侨服从日本占领军的殖民统治，然后利用华侨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为日军的侵略战争、掠夺政策服务，以实现日本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吴凤斌1993：731）1943年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各地抗日力量加强，日本军政当局对华侨

的高压政策涂上了一些温和色彩，以争取和拉拢华侨，对华侨的管制明显放松。这种“先镇压、后绥靖”的高压政策，令华侨社会遭受了难以言喻的屠杀、酷刑、监禁、剥削、掠夺和奴役等伤害之后，又陷入担忧、后怕、紧绷、失措的惶惶不可终日之中。除了小部分或被逼或自愿为日本军政当局差役的国贼和汉奸得以暂时自保外，一般百姓大多都难逃日寇的毒手。国难当前、前耻未雪，大部分华侨自然都极大程度上体验到国家被占、人民被俘的耻辱，因此广大华侨社会始终与日本军政当局保持畏惧和敌对状态。所幸，在苦难消极的氛围下，华社奋发图强的意志一直没有消亡。

由于日军入侵砂拉越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规模较大的抵抗，因此相较于新加坡数万人遭屠杀的“华侨大检证”（“肃清”）之役、柔佛新山数千人被奸杀、吉隆坡及檳城的两次“大检举”和马六甲的千人大屠杀，砂拉越华社所遭受的苦难显得较轻微，不过这并不表示砂拉越人民就逃得过日军的残暴统治。砂拉越沦陷期间，除了诗巫筹赈会人员的大逮捕及抗日会株连的屠杀义士两次大事件，日军在砂拉越犯下的战争罪行自是罄竹难书。

光复之际，大家不仅庆幸灾难已过去，同时也开始出现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的转向，因为他们深刻体会到一个事实：当战火燃起，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都保护不了远在砂拉越的子民，华人必须抛弃固有的移民思想，转而关心居留地的一切状况，并愿意与其他种族共同建设这个本应独立自主的国家，才可能避免再次遭受侵略和被掠夺的灾难。就像在马来亚的华人群体那样“为马来亚献身，并不顾生命地保护家人、财产和权力，这是战前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去做的”。（Cheah Boon Kheng 2002: 28）

日据暴政毫无疑问成为当地华人和其他族群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让他们在备受苦难之际萌生了自强自救的希冀，背负着民族的苦难激发了民族精神的迫切需求。战后星马与婆罗洲华人之所以开始积极争取公民权和参与政治运动，日军占领期间的惨痛经验正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林水壕、骆静山1984: 87）

注释

- 1 砂拉越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黄庆昌在1939年联合各属侨领组成筹赈会，众人咸认需要办一份报章，让民众掌握中日战争前线实况，以发挥号召力和影响力，于是《砂朥越日报》便于1939年10月25日成立，刊登了砂朥越日报报社董事名单，以及各省、县、埠的华侨筹赈会与分会名单，记录了全砂共三十三个筹赈会与分会约七百三十八名相关人士。日军入侵前夕，大部分主事人都将手上这份名单销毁，以免受到牵连。唯当时诗巫筹赈会的天猛公拿督陈立训冒死秘藏一份名单，直到2005年才被其后人偶然发现，这份珍贵文件已由其公子陈锡鑑转赠给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馆藏。（房汉佳、林韶华2013：284、311）
- 2 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是福建华侨创立的海外华侨中动员力最强、规模最大、助战成绩最为显著的抗日救国团体，也是当时东南亚地区抗日救亡的华侨最高领导机关。创会主席陈嘉庚以“增筹赈款，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抗战中之难民……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藉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藉吾人之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号召东南亚侨胞筹赈救国，成为南洋华侨第一次不分地域帮派、不分政治倾向、不分社会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团结的组织。（陈嘉庚1979：55-67；曾瑞炎1988：72）
- 3 当时日军限令砂拉越华社缴交至少175万元越币的国防金，其中古晋区华社要缴交100万元，诗巫75万元，其他地区缴交数目不详。征收工作就由“同调会”负责，向所有有财产的华人收取总财产的8%，此外还要缴交5%的不动产地税。（杨曜远2018：44-46）
- 4 日军将各地的教会学校、福建义校、中华学校、俱乐部，甚至望族大屋改设为“慰安所”，从万隆、爪哇、荷属东印度、中国、台湾、韩国及砂拉越本地搜捕到的数百名女性在这里成为日军泄欲的“慰安妇”。这导致华人的大恐慌，许多父母被迫乱嫁女儿。在伊班长屋，则有许多单身男子“认领”单身女子为妻，以免她们被抓去当“慰安妇”。（杨曜远2018：53-54）
- 5 除了砂拉越，依思迪克准将也在此次投降书签署仪式上代表联军收复日军在沙巴、汶莱和纳土纳群岛的占领。（Gabriel Tan 2009: 174）

参考文献

- 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Y.安达娅2010；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楚天2018。〈记一代抗日英雄李亚留〉。《星洲日报》2018年5月16日第12版。
- 蔡增聪编2007。《战前诗巫筹赈运动史料选编（1937-1941）》。诗巫：砂拉越华族

文化协会。

陈鸿瑜2012。《马来西亚史》。台北：兰台出版社。

陈嘉庚1979。《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

陈毅明、汤璐聪编2005。《南侨机工抗战纪实》。厦门：鹭江出版社。

房汉佳、林韶华2013。《英雄的故事》。古晋：砂拉越华人学术研究会。

何凤娇编1999。《东南亚华侨资料彙编》（一）。台北：国史馆。

黄建淳1999。《砂拉越华人史研究》。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

黄孟礼2007。〈试读林开臻的一生〉。《文海》5：9-14。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3。《北婆罗洲、婆罗乃、砂劳越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孔飞力2016；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李思涵2015。《东南亚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李盈慧1999。〈抗战时期华侨抗日捐献与相关纷争〉。载《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册）。华侨协会总会主编。台北：华侨协会总会，53-73。

梁英明、梁志明等2005。《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册）。北京：昆仑出版社。

林水椽、骆静山1984。《马来西亚华人史》。雪兰莪：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刘伯奎1983。《砂劳越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实录》。新加坡：长夏出版社。

刘咏芝1984。〈沦陷时的诗巫〉。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蔡史君编修。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603-616。

刘子政1996。《诗巫劫后追记》。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秦钦峙、汤家麟1989。《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丘立基2003。《砂劳越史话》。古晋：黄文彬报业机构。

吴凤斌主编1993。《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杨建成主编1983。《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

杨曜远2018。《日军铁蹄：日本侵占砂拉越1941-1945》。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佚名2018。〈百岁机工李亚留辞世〉。《星洲日报》2018年5月5日第11版。

约翰·基根2015；李雯译。《二战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曾瑞炎1988。《华侨与抗日战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钟业昌、吴清雄主编2010。《铁血滇缅路——重走滇缅路寻访南侨机工事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振源、家昌、兆良、德财1995。〈新福州难逃铁蹄劫〉。《国际时报》1995年8月14日第14版。

Bob Reece 1998. *Masa Jepun: Sarawak Under the Japanese 1941-1945*. Kuching: Sarawak Literary Society.

- Cheah Boon Kheng 2002.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Collection Database of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1945. Kuching, Sarawak. 1945-09-11. Aboard the Corvette HMAS Kapunda General H. Yamamura, Commanding Officer of Japanese forces in the Kuching area, hands his sword to Brigadier T. C. Eastick, Commanding officer, Kuching For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ormal Signing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In the right background is Lieutenant A. J. Ford Ranr,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Kapunda. At the Extreme left a person is either broadcasting or making a recording of the proceedings. Retrieved on 18 July 2018 from <https://www.awm.gov.au/collection/C258374>.
- Gabriel Tan 2009. *Japanese Occupation Sarawak 1941-1945*. Kuching: Penerbitan Sehati Sdn. Bhd.